

跨文化文本空间中的性别对话

——从《女勇士》中花木兰形象解读汤亭亭的跨文化叙事

张鲁宁

(南京林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37)

摘要:美国当代作家汤亭亭在《女勇士》第二章《白虎山学道》中以中国传统故事中的花木兰为原型,通过融入中西文化元素塑造了一个现代“女勇士”形象,集中展示了她作为华裔作家的跨文化叙事策略。汤亭亭在《白虎山学道》中通过对于圣经、佛教和道教典故的改编和移植,在文本中建构了融汇东西方不同宗教文化的跨文化空间。跨文化空间的构建和“汤氏花木兰”形象的塑造不但在文本想象层面实现了男性和女性的性别对话,同时也传达了作家对于消解现实生活中以男权主导的性别对立模式的诉求。

关键词:汤亭亭;《女勇士》;“汤氏花木兰”;跨文化叙事;性别对话

中图分类号:I3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5)04-0063-04

双重文化赋予了汤亭亭独特的创作背景,她特别善于从各种东西方文化元素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写作素材。可以说,跨文化叙事是汤亭亭的一个重要标签。汤亭亭在作品中改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叙事策略常常遭到一些批评家们的误解,但汤亭亭自己却认为这是非常有用的叙事策略,认为“用美国人的方式”讲述中国传统文化是让中国传统文化长生不老的方法,而且要想把中国传统文化变得有用,就要对它进行改编^{[1]18}。

不同宗教文化的运用是汤亭亭跨文化叙事的一个重要方面。在重塑花木兰形象时,汤亭亭注入了中西宗教文化元素,将圣经、佛教和道教中的典故揉进花木兰在白虎山习武训练的部分,通过隐喻手法建构了一个能够消解各种二元对立的跨文化空间。本论文主要聚焦《白虎山学道》中的花木兰形象,重点解读作者对于圣经、佛教和道教典故的巧妙运用和糅合,探讨作家如何通过融汇东西方宗教文化的叙事策略在文本中构建跨文化空间。汤亭亭借助跨文化叙事策略在文本中构建了一个融入中西文化元素的跨文化空间,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汤氏花木兰”形象,不但在文本想象

层面实现了男性和女性的性别对话,同时也传达了作家对于消解美国华裔现实生活中性别对立的诉求。

一、跨文化叙事——东西方宗教文化的交汇

汤亭亭笔下的花木兰和中国传统作品《木兰辞》中的花木兰有着很大的不同,增加了很多花木兰习武训练的过程,而且《圣经》中耶稣山上受训的经历也被移植到花木兰身上。在《白虎山学道》的开头,花木兰被置于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中习武,首先学会屏气安静,然后做各种训练,直到她的身体变得非常强壮,“甚至可以控制瞳孔的扩大”,跑起来和鹿一样飞快^{[2]21}。经过七年的刻苦练习后,她被要求只身一人在山里经受严峻的考验,包括寒冷饥饿、各种诱惑、以及死亡的威胁。在经历种种艰难困苦之后,女勇士意志更加坚定,也成功塑造了自己的性格。山上受训的经历赋予了女勇士各种神秘的幻想,帮助她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理解这个世界。

女勇士的这一番经历和耶稣四十昼夜的旷野

收稿日期:2015-08-16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哲社基金项目(2011SJD750034)的结项成果

作者简介:张鲁宁(1977-),男,山东济宁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美国文学研究,当代西方文化研究。

经历非常相似。郑洛才(Cheng Lok Chua)在比较了女勇士山上受训的经历和耶稣旷野受训的经历之后,认为:“花木兰在旷野受训,让人想到耶稣——第二个亚当,在旷野与魔鬼的第一次较量”,而通过花木兰山上受训的经历,“汤亭亭似乎把女主人公的力量放在人类这个整体上,感受人类与自然的融合”^{[3]149}。《新约》中的耶稣被引入旷野,忍受魔鬼的诱惑。虽然耶稣“那些天什么都没吃,挨饿四十天后”,他仍然强壮,拒绝服从魔鬼的命令^{[4]107}。在抵制各种诱惑后,耶稣精神饱满地在加利利施教,受到公众的赞扬。旷野受训的经历使耶稣确立了自己的身份,作为上帝之子来拯救世人;在死亡之地的经历成为花木兰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她达到精神超脱的必经之路。

除了圣经典故的运用,汤亭亭还在花木兰山上受训时融入了佛教典故。当女勇士独自一人在死亡之地忍受饥饿的考验时,一只兔子跳到她身旁,然后蹦到火中。白兔跳到火里的目的是牺牲自己给花木兰提供食物。白兔自我牺牲的故事可以在佛教典故中找到踪影。当佛祖在野外遭受饥饿时,森林里的动物都纷纷给他带来食物,但是只有兔子无私地跳到火中奉献了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身体为佛祖提供食物。佛教中的这个典故喻示着人只有忘却自我才能涅槃。而在汤亭亭笔下,花木兰在吃完兔肉以后也实现了顿悟,表明女勇士在经历严峻考验后也获得了重生。正如格里姆所言:“这个片段表明女勇士在多年的精神修炼后达到了佛的境界”^{[5]156}。

在《白虎山学道》中,花木兰走到野外开始训练时首先遇到了蕴藏着道教阴阳智慧的一位老汉和一位老太太,正是这对阴阳组合把花木兰训练成一名勇士。根据道家哲学,在自然和宇宙里有一个绝对真理。这个真理称为太极,有阴阳两面。阴阳相互运动形成宇宙一切现象的永恒运动。阴有着暗的、被动的、女性的一面;而阳则有着明的、坚定的、男性的一面。二者的永恒转换的宇宙节奏就是“道”和“永恒”。在《白虎山学道》中,这对老夫妇住在“象征着人类与自然生态和谐”的一间房子里^{[3]149}。女勇士在山上受训后实现顿悟后,看到“一对金人儿跳着大地之舞”。这对男女旋舞如此美妙,简直就像地球旋转的轴心,“他们是光;是熔化的金子在流变——一忽儿是中国狮子舞,一忽儿又跳起非洲狮子舞。”^{[2]24}他们的运动模式平衡而有规律,正如道家的阴阳组合一样,

女性和男性融合在一起,超越一切界限,最终成为一个统一体。在表演完印度舞、印第安舞之后,金人儿跳起了预示未来的舞蹈——是未来的机器时代。女勇士像禅宗里的顿悟一样,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时间犹如北极星,既在那里旋转,又是固定不动的。耕耘劳作与舞蹈并无不同;农民穿的破烂衣衫像皇帝的金冠玉带一样金碧辉煌;舞者之一终究是男性,而另一个则终究是女性^{[2]24}。

可见,花木兰的“顿悟”明显印证了道教有关和谐生命的信条,即体验万物的和,而不是分。张钟元(Chang Chung - yuan)认为:“道的价值在于它能从更高的境界调和对立事物”^{[6]138}。人要达到这样的高度,就要放下所有个人偏好。正如庄子所言:“当‘这’和‘那’没有区别时,就达到了道的极点。从这个极点,人们可以看到万物无限”。达到统一境界的女勇士实际上获得了道的智慧,跨越对立事物的界限。于是,这支舞“暗示印度教的生死之舞,或基督教的死后重生之煎熬”,也让人联想到道教里的阴和阳、女和男、黑和白^{[3]149}。

不同宗教文化典故的运用传达了汤亭亭对中西文化融通的态度,正如苏·安·约翰逊(Sue Anne Johnson)所言,在汤亭亭的世界里,“东方和西方就像阴和阳、女性和男性一样,相辅相成,不可分割。”^[7]汤亭亭在文本中融合东西方宗教文化的跨文化叙事策略在文本中建构了跨文化的空间,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其笔下的花木兰形象奠定了基础。

二、跨文化文本空间——性别对立的消解和融通

在《白虎山学道》中汤亭亭有意识地借用东西方各宗教文化元素,通过跨文化叙事策略建构了一个消解中西二元对立的文化空间,这一切都旨在刻画一个全新的“汤氏花木兰”形象。

汤亭亭笔下的花木兰既是勇敢的战士又是温柔的妻子,性格既刚烈又温柔,对敌人毫不手软,对弱者却心怀怜悯。而且,花木兰的后背和岳飞一样也被父亲用锋利的刀子刺上了字。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花木兰成为一个既具有男性特征又有女性特征的人物形象,是伍尔夫在《奥兰多》中塑造的雌雄双性同体形象。伍尔夫曾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对女性地位和男女关系发表了深刻独到的见解,认为“男性的力量”和“女性的力

量”一起“和谐地生活,精诚合作的时候”是一个“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8]93}。汤亭亭本人在一次采访中表达了自己对伍尔夫《奥兰多》中塑造的雌雄双性同体形象的偏爱:我发现每当我经历人生或工作的低谷的时候,只要我读了伍尔夫的《奥兰多》,我就重拾动力。我喜欢这本书,因为她让一个角色活了400年;奥兰多既可以是男人,也可以是女人。伍尔夫冲破了时间界限,冲破了性别差异,冲破了文化隔阂^{[1]161}。

可见,汤亭亭通过塑造了“汤氏花木兰”形象打破了男性和女性的二元对立体系,在文本中强调了两性对话和合作的重要性。因此,从这个层面来看,汤亭亭在文本中融合东西方宗教文化的跨文化叙事策略真正意图是在文本中构建跨文化空间,从而营造性别对话的空间。换言之,汤亭亭在塑造雌雄双性同体形象时,把东西方宗教文化加以融汇,呈现出阴阳结合的意象,目的在于希望实现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成功对话。正是借助跨文化叙事策略,在《白虎山学道》的文本空间里,一切基于种族、性别和文化的自我封闭的形式都走向开放,一切自我和他者的对立形式都逐渐消磨。正如索罗斯所言,东西方文化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暗示了传统性别角色的突破”^{[5]157}。

跨文化叙事的策略除了在文本中积极建构了消解两性对立的对话关系,同时也表达了汤亭亭对现实生活中美国华裔性别歧视的不满。从《白虎山学道》这一章节的结构来看,前半部分约四分之三的篇幅均讲述了女中豪杰花木兰如何刻苦练功,英勇杀敌,最后光荣凯旋隐退乡下的故事。而后半部分则讲述了叙述者在现实中不愉快的经历。由于《女勇士》被视为半自传小说,因此,叙述者在文本中叙述的经历往往也被理解为是创作者在现实中的遭遇。张敬钰认为,汤亭亭在小说中塑造的理想的女勇士形象恰恰反映了作家本人在现实中的失意,正如她所言:“赋予自我以权力的幻想也是自我挫败的表征,神话中传达的愿望正是创作者所处的现实生活中缺乏的东西”^{[9]87}。

《白虎山学道》将理想中的花木兰形象和叙述者的现实生活相并置,传达了作家希望消解现实生活中性别对立的文化诉求。《白虎山学道》的开头通过口述体使叙述者从现实转入想像:“当我们中国姑娘听到大人讲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当巾帼英雄,女勇士……也许过去的女人是危险的,所以不得不把她们的脚缠起来。仅在

两百年前,白鹤拳的发明人就是一名妇女。”^{[2]16}而“我在美国的生活真令人失望”的叙述又使文本从想象转向现实,通过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歧视和花木兰这一双性同体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在现实生活中,汤亭亭童年面对的情形是极为残酷的。她在成长过程中始终有着挥之不去的恐惧,害怕被卖作奴隶或被卖作别人的妻子,而且她亲身感受到她的兄弟比她和她的姐妹的地位更重要,这种歧视在他们生活仪式和庆祝活动中尤为明显。很多童年时听到的厌女言论使她深恶痛绝,通过各种途径加以反抗,试图打破传统观念中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尽管她取得很好的学习成绩,也坚决不做饭,但这种抗争的力量微乎其微。

但是,借助跨文化书写的策略,汤亭亭在文本中却呈现了一个现实和幻想得以并置的跨文化空间,为自我和他者创立了一个性别对话框架。而且通过将自己和女勇士建立联系,汤亭亭希望创造积极的两性对话关系:我和传说中的女勇士不无共同之处。但愿我的那帮人能早日明白,我也好回到他们身边。我和女勇士的共同之处就在于都要把要说的话藏在背后。汉语里说“报仇”,意思是“告发”和“株连五族”,而不是非得砍脑袋挖心肝不可,需要的只是说说而已。我可是有不少话要说,有好话也有坏话,但不适应刻在我的皮肤上^{[2]49}。

可见,汤亭亭通过创造一个超越传统性别界限的女英雄形象在文本中建构了跨文化的空间,而她本人也得以超越厌女传统,克服了她自己所说的“厌女”情绪。正如 Joanne S. Frye 所言,汤亭亭对女性经历的反叛“是强烈声明新的可能性和对现实的整合——表明幻想不是完全与世隔绝的内心想象世界,而是用来重塑超越个人日常生活经验的有力工具”^[10]。因此,借助跨文化的叙事策略,汤亭亭也为自己内心找到了自我与他者的平衡。

三、结论

在文本中,她提取中西方宗教文化中的相关元素滋养自己的创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跨文化叙事策略。在《女勇士》中,她借助一个全新的“汤氏花木兰”构建了中西方宗教文化交汇融通的跨文化空间。汤亭亭通过注入中西方宗教文化元素使山上受训后的花木兰成为雌雄双性同体的新女性,象征了汤亭亭对男女两性理想模式的设想和

诉求。同时,“汤氏花木兰”形象也是汤亭亭对现实生活中性别对立模式的反拨和批判,表达了她对现实生活中以男性为主导的性别霸权的不满,

也表达了她希冀两性平等对话、和谐相处的人文诉求。

参考文献:

- [1] Skenazy Paul, Tera Martin eds. Conversations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M]. Mississippi: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8.
- [2] 汤亭亭. 女勇士[M].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98.
- [3] Cheng Lok Chua. “Mythopoesis East and West in ‘The Woman Warrior’.” Approaches to Teachi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 Ed. Shirley Geok - lin Lim[M].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1.
- [4] Luke. Holy Bible[M]. Nanjing: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1995.
- [5] Ghymn, Esther Mikyung. Images of Asian American Women by Asian American Writers[M]. New York: Peter Lang, 1995.
- [6] Chang Chung - yuan. From Mary Pat Fisher and Robert Luyster[M].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Inc. , 1991.
- [7] Johnson Sue Anne. Empowerment through Mythological Imaginings in ‘The Woman Warrior’ [J].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Criticism. Vol. 121. New York: Gale Research, 1998(121):288 - 296.
- [8] 弗吉尼亚·伍尔夫. 一间自己的屋子. 北京: 三联书店, 1992.
- [9] Cheung King - Kok. Articulate Silence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 [10] Frye Joanne S. The Woman Warrior: Claiming Narrative Power, Recreating Female Selfhood[J].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Criticism, 1998(121):257 - 264.

A Study on the Intercultural Narration in Maxine Hong Kingston’s Woman Warrior

ZHANG Luni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37, China)

Abstract: Maxine Hong Kingston, a contemporary Chinese American writer, showed her intercultural narrative strategies in Chapter Two The White Tiger in her novel Woman Warrior by portraying Hua Mulan as a modern woman warrior with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elements. This paper focuses on how the author constructed an intercultural space with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religious cultures by adapting and using the stories of Bible, Buddhism and Taoism in Chapter Two of Woman Warri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cultural space and the portrayal of Kingston’s “Hua Mulan” make it come true in the text that man and woman have a cross - gender dialogue and meanwhile express Kingston’s strong desire for changing the male - dominated model of gender opposition.

Keywords: Maxine Hong Kingston; Woman Warrior; Kingston’s “Hua Mulan”; intercultural narration; cross - gender dialogue

(责任编辑:沈建新)